

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隨筆集

陽光 與麵包的 聯想

● 樊綱著

龍圖覽

**Economics of
Sun and Bread**

四川文藝出版社

1174446

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隨筆集

F-52
<11>

陽光 與麵包的 聯想

樊綱著



22335656

四川文藝出版社

特邀策划:伍江陵

责任编辑:王 森

封面设计:文绍安

责任校对:韩 华

监 制:华 西

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书 名

阳光与面包的联想

定价:16.80 元

作 者 樊 纲

ISBN7-5411-1660-2/I·1466

1996 年 11 月 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0.375

字数 200 千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峨影印刷厂印刷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

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等学术专著,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 ESCAP, OECD 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 CNN, New York Times, Financial Tim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Wall Street Journal, Handelsblatt, Nikkei, BBC 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序

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几年写下的一些可以被称作“经济杂文”的文章。始作俑者，应该说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该报创办不久，他就有了办“专栏”的想法，约我开个头。我当时感到他原来的想法是要在报纸上有些“时评”一类的文章，我也曾设想如此去做，就宏观经济的走势、当时争论较多的话题发表看法，但一旦下笔写去，却又觉得有点一般化，况且这类文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登，为什么偏要在“专栏”里做？不如弄得有点个人特点、有些新意，用一种通俗的语言，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介绍一些经济学的道理。于是有了《皇冠上的明珠》、《骗出一套新体制》、《阳光与面包的联想》一类的文章。

《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专栏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较短，内容与形式相对较为多样一点，特别是因为知道读报的人们多是经济研究者或经济工作者，对经济学的问题都有所了解，因此后来写了好几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经济学发展等方面的文章，与读者们讨论。也可以说，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形式、更

为“统一”的一组文章，后来出现在《经济导刊》上。该刊编辑部主任乔桐封邀我主持《经济沙龙》专栏，每期一篇，面对较为多样的读者，专写一事一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解疑释惑的文章，文章的篇幅也较长一些，容许把道理说得更透彻一点。于是，在乔桐封的“催逼”之下，两月一次，定期发出，三年的时间，形成了《在小贩扎堆背后……》、《电话亭里的经济学》、《居民楼里的公共物品》、《青春宝贵与职业选择》等一组形式较为统一、篇幅基本一致、内容也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而不是讨论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文章。

以上两组文章，应该说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另外，本书也收集了《求解命运的方程》一书中的几个章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社编辑杨钢的提议下写成的。它应该说从头到尾都属“经济杂文”，也是想用通俗的方式，用经济学的道理与方法来说明生活中、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这里收进的几个章节都曾被各种杂志、报刊以不同形式摘选刊登过。

我想，一名经济学研究者至少应当会写三类文章：一类是面对“圈内人”写的专业论文，即用专业的术语，讨论经济学专业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理论与实证的问题。这类文章可称为“专业论文”，刊登在专业杂志（如《经济研究》）上，而这类杂志原则上说非专业人士也是不看的；第二类是专对制定经济政策的人们（既包括政府的决策人，也包括公司企业的决策人）所写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分析性文章。这类文章也要求把理论模型用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使各方面官员和研究人员得以讨论。这类文章可以称作“政策文章”，报刊杂志上多数文章应属此类；还有一类，就可称作“经济杂文”了。经济杂文就内容来说，既可以讨论一个理论问题，也可以讨论

一个政策问题，从形式上说也是要求通俗易懂，因此不同于专业论文。但我想这种“杂文”与“政策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们的目的不是“对策”，而是“解惑”。解惑当然也有益于对策，而且是对策的前提与基础，但它不直接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而只是力求说明一类经济现象，说明一个经济学的道理。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杂文与经济学的“专业论文”性质更加接近，因为二者的主要目的都是“解惑”。有的人总想让“专业论文”直接提出一二三四条政策建议，其实是“难为人”的，专业论文“解惑”，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下面的事应由另外的政策文章以至另外的政策研究人员去办。

当然，经济杂文与其他经济类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就在于它要求语言文字更加生动些，不像专业论文与政策文章那样“枯燥”。又要理论正确，又要深入浅出、说透问题，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应该说是作者们的一大挑战。

从读者这几年的反映来看，我想人们是需要经济杂文的，因为它们起到了普及经济学知识、帮助大家理解各种经济与社会现象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经济学基础知识教育还不普及、不发达的国家里尤其是这样。南方一家报纸曾登过一篇文章，希望我多写、甚至“主要写”经济杂文供大家看。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经济杂文集”，也是反映了人们对这类文章的需要。

从我个人来说，倒并不是由于人们拉我写经济杂文才被动行事，而是因为我自己的确喜欢在刻板的专业论文之外写些轻松一点、活泼一点的经济杂文。把对经济学的一些了解与体验，用较为通俗、形象、具体的方式写成大家较容易接受的文字，应该说也是一种享受（这并不否定写专业论文也有它特殊的享受）。但我也可能写得再多，这几年约我写专栏的报刊

杂志还有若干家，我都没有允诺。毕竟，我还有其他的研究要做，有其他的文章要写，不能一天到晚总写杂文。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要想写好也要费一番心思，花一定的时间，还要放一放润色修改，并不像有人说的“随手的事”。杂文写得太多，其他的事就别干了（这一点请被拒绝的报刊杂志谅解）。不过无论如何，能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做一点贡献，是我们这些人的一大快事。也希望读者们能从这些杂文中读出些乐趣，从而提高对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兴趣。经济学本身会随着懂得它、研究它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值，虽然我们这些人会随着在同一市场上“竞争者”人数的增加而贬值。

1996年10月27日 韩联

目 录

序.....	(1)
骗出一套新体制.....	(1)
“皇冠上的明珠”.....	(6)
顺毛摸驴.....	(9)
所有权开始起作用了!.....	(11)
论“手脚并用”.....	(15)
论“双重代理”.....	(18)
“阳光”与“面包”的联想.....	(22)
利益冲突与调解冲突的规则.....	(26)
着眼于新的基础.....	(30)
经济矛盾与经济学家.....	(36)
经济学家谈道德?.....	(45)
再“谈道德”.....	(50)
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差距.....	(54)
再论“人口迁移”.....	(60)
优先培养民族民间投机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札记之二	(69)
用制度降低风险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札记之三	(73)
在“小贩扎堆”背后	(79)
腐败的经济学原理	(84)
街头公用电话中的学问	(89)
讨价还价者言	(94)
居民楼里的“公共物品”	(100)
如何搞“人工增雨”？	(107)
尽快停止复制旧体制	(115)
未完成的雕像	(121)
“影楼”与“月饼”	(126)
“不自由的市场”	(132)
“公用浴室”与“外延式发展”	(137)
“老鼠会”、股市及其他	(141)
酒馆、盒饭、理发摊	(146)
从加拿大不说实话的华人说开去	(150)
理发、洗发、国民总产值	(156)
走进风险的世界	(163)
通货膨胀、权威主义与“谈判文化”	(168)
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	(176)
作为制度的文化	(186)
对幸福的评价	(196)
金钱、权力与自由	(215)
“为他”与“为己”	(230)
能力、需求与机会	(243)
远虑与近忧	(260)

“治学经济学” 胡侃	(273)
选择闲暇	(280)
给自己多攒点闲暇	(283)
让青春更好地选择	(286)
社会博弈与制度建立	(291)
市场无需大智慧	(296)
“市场发育” 杂谈（四则）	(299)
市场、风险与制度	(309)

骗出一套新体制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月，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梳梳光，一副金丝眼镜，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作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小‘托’”小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作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以至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

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多了起来。骗子多了，正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个数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这些东西，不能仅当作一种“美德”来看，而也得当作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所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所遵守。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劲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谁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帐，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

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是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容易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艺，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向别人诚实的问题便突出了起来。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帐的是爷爷、要帐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像“要债公司”、“家族势力”之类，“黑帮团伙”也会趁火打劫。“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作“公共物品”来加以提供，就会有人来当作“私人物品”来加以提供，同时就难免产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

再走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协”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难学会防骗，所以在开始不可能把一切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订得越严密。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作为一个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东西，有真切的爱、善良的愿望、温暖的友情、诚实的信誉、“利他主义”、好人是多的、人间是暖的，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宁可把人先假定为是“恶的”、“丑的”，无时无刻不想骗人的。我想这可能反倒有利于经济制度的完善，经济问题的解决。天下的事不怕多往坏处想，只怕只往好处想，一厢情愿地上当受骗。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坏处，因为为防小人所设的制度，有时会约束到了君子头上，浪费了君子的时间，比如签合同之类的事就是如此。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为了保障君子的利益。没有有效的制度防小人，小人就会泛滥起来，直到最后

不再有人去当君子。道德的沦丧，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教育”不够，而在于制度不灵。也正因如此，我宁可相信制度，而不相信“人性中的美德”。

(原载 1993 年 1 月 28 日《经济学消息报》)

“来自本土的星星”

最近读报时，看到一些关于“本土的星星”的报道，不禁感到一阵唏嘘。这些报道，有的说“本土的星星”已经陨落，有的说“本土的星星”正在崛起。其实，无论怎么说，这些报道都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希望，也看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这“崛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希望，也看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崛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希望，也看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崛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希望，也看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崛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希望，也看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